

河北蔚县暖泉镇后涧遗址考古发掘收获

泥河湾盆地位于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间的过渡地带,其以完整的第四纪古人类活动序列和丰富的文化遗存闻名,是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核心区域,亦是探索东亚地区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关键地区。狭义的泥河湾盆地特指阳原盆地,而广义的泥河湾盆地则涵盖了由桑干河及其支流串联起来的大同、阳原、蔚县、涿鹿、怀来等一系列盆地,共同构成一个史前人类活动密集、技术发展脉络清晰的地理单元。蔚县盆地作为广义泥河湾盆地东南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旧石器考古研究起步较晚。自2003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盆地内确认了十余处旧石器地点,但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2015年至2018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研究员团队在蔚县盆地开展了持续性、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工作,先后发现多处属于中、晚更新世的旧石器遗址,并系统发掘了前上营和吉家庄遗址,收获了一批较为丰富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材料。然而,蔚县盆地内经过系统发掘的包含细石器技术的遗址仍然十分有限,仅有西沙河遗址一处见诸报道。在此背景下,后涧遗址的发掘为该区域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研究补充了重要证据。

遗址概况及发掘情况

后涧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暖泉镇风水庄村东,堆积埋藏于壶流河左岸第二级阶地前缘,海拔约940米。该遗址发现于2017年至2018年在河北省文物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支持下的系统旧石器考古调查中。在调查过程中,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暖泉镇北部的棕黄—褐灰色粉砂层中发现了细石器及动物碎骨,随后根据地貌位置,地层堆积特征及对遗物的初步观察,确认为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遗址,命名为后涧遗址,并初步判断其年代属于晚更新世晚期。

2020年9月至11月,联合考古队对后涧遗址开展了为期65天的正式发掘工作,并于2022年进行了补充性的深沟发掘,以进一步厘清遗址的堆积状况。发掘工作以遗址西南角为基点,以北为正方向,采用全站仪进行精确布方,探方规格为1米×1米,发掘总面积4平方米。遗址地层剖面深度约5米,自上而下可划分3个自然层,分别为灰—棕灰色粉砂层(1~1.1米)、棕灰—灰黑色粉砂质黏土层



后涧遗址典型标本

(0.5~1.3米)、棕黄—棕灰色粉砂质黏土层(>2.9米),其中旧石器文化层位于第三自然层中下部,平均厚度约2米。

联合考古队在去除上部自然堆积后,以5~10厘米为一水平层对文化层进行逐层揭露,2020年共清理20个水平层,2022年探沟清理5个水平层。对所有出露遗物均进行现场拍照及产状测量,同时采用全站仪记录三维坐标,确保获取完整的空间分布信息。文化层内堆积均经过系统筛选,以最大限度地采集遗物,筛选获得石质标本99件。在发掘过程中同步采集了年代和环境分析样品,为复原古人类生存年代和环境背景打下基础。

出土遗物

后涧遗址2020年及2022年两次发掘合计出土编号标本650件,包括石质标本624件,动物化石26件(包括动物骨骼化石16件、

牙齿化石10件)。结合筛选所获材料,石质标本总数为723件,为分析遗址的技术特征提供了坚实基础。

初步整理及观察结果显示,后涧遗址石质标本尺寸整体较小,以微小型为主;原料种类丰富,以火山角砾岩为主,燧石次之,另有硅质白云岩、砂岩、凝灰岩、石英岩、玄武岩、流纹岩、蛋白石、玛瑙等共计17种。类型包括具有人工打击特征的石制品和无人工打制痕迹的砾石两大类。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含细石核)、石片(含细石叶及副产品)、工具、断块和碎片,整体反映出该遗址拥有石核石片技术及细石叶工艺两套技术体系,尤以细石叶技术为特色。细石核包括楔形石核及船形石核两类,且原料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楔形石核以火山角砾岩为原料,而船形石核则主要选用质地均匀的燧石,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古人类对不同石料物理特性与细石叶剥片要求的深刻理解。工具以边刮器数量最多,端刮器次之,另见石锤2件及少量凹缺器、石钻及矛头等。

在动物遗存方面,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数量有限且风化严重,保存状况较差,可鉴定标本仅6件,均为马(Equus sp.)牙,筛选出的碎骨均无法进行种属鉴定。

年代及学术意义

为建立精确的年代框架,发掘团队已从不同水平层选取6件样品(包括4件骨骼和2件牙齿)。结果显示,遗址校正后的年代范围为距今1.8万~1.6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此外,为进一步验证和补充年代数据,光释光测年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后涧遗址是蔚县盆地内继西沙河遗址之后,又一处经过系统发掘的细石器技术遗址,它的发现不仅扩展了该地区细石叶技术的分布范围,其明确的层位关系、清晰的年代数据与丰富的石制品组合更为构建该区域旧石器晚期文化序列与石器技术演变提供了关键实证。其距今1.8万~1.6万年的年代范围,恰值末次盛冰期向冰消期过渡的关键阶段,这不仅为研究该时期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策略提供了宝贵材料,更在研究和探讨末次冰消期阶段中国华北地区甚至东北亚地区人群迁徙扩散和文化交流等科学问题上具有重要价值。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省东方人类起源与文明探源重点实验室 执笔:高佳璇 裴文雁 牛东伟)

湖南沩水流域发现大型楚文化聚落遗址

——湖南宁乡向家洲遗址发掘收获

向家洲遗址位于湖南省宁乡市老粮仓镇回春村和江花村,是近年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地域文明探源时新发现的一处遗址点。遗址分布于沩水上游支流楚江(又称“流沙河”)与杨华江交汇处的台地上,遗址所在的老粮仓盆地是整个楚江流域地势最为平坦开阔的区域,也是沩水流域除黄材盆地之外出土商周青铜器(尤其是铜铙)较为集中的区域。通过沩水、桃花江等水系可直达湘江和资水下游,遗址周边分布有花草坪、小胡山、笋子坳、河边上、刘家湾等数十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点,其中花草坪遗址和刘家湾遗址明确发现了与向家洲遗址同时期的东周遗存。

调查勘探

2022年10月至12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向家洲遗址开展了初步的调查勘探工作,通过地表踏查、断面清理、主体区域普探和边缘区域探卡探等方式,初步探明遗址现存面积不低于50万平方米,发现有灰坑、水井、陶窑等遗迹,采集到陶鬲、罐、豆、纺轮和石斧、石铲等标本。在2019年调查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廓清了向家洲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

另外,通过走访当地村民得知,以往在遗址范围内因开挖水渠、烧砖取土和村民建房等生产活动中曾先后三次在不同地点发现过东周时期的青铜兵器(剑、戈等),其中以2002年发现数量最为集中,根据组合特征和出土点地貌环境(地势略高的山前岗地)推测可能出自墓葬。

考古发掘

2023年5月至8月,为配合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向家洲遗址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此次发掘主要根据水渠走向对水渠内挂壁遗迹延伸分布区域及底部暴露的遗迹和文化层堆积进行布方发掘,发掘区分东西二区,西区布设探方2个,东区布设探方12个。遗址发掘区内地层堆积相对较为简单,可分为5层:①层为现代耕土层,②③层为宋元至近现代堆积层,④层为战国末至秦汉时



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标本根据质地差异可分为陶器、铜器、铁器、石器、木构件等,以陶器为主,根据功能用途分为生活用器、建筑材料和生产工具。其中生活用器主要有鬲、孟、豆、罐、盆、甑、钵等,质地主要为夹砂陶,也包含少量泥质陶和印纹硬陶(表面饰米字纹、叶脉纹、方格纹等),建筑材料有板瓦、筒瓦等,生产工具具有陶纺轮、陶拍等。青铜器有箭镞、刮刀、带钩、鼎足等。铁器有锄、戈等。石器有斧、锛、铲、砺石等。

初步认识

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情况表明,向家洲遗址是一处时代单纯、遗迹类型及堆积包含物丰富的大型楚文化遗址。出土典型遗物特征表现出楚、越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其中楚文化因素占绝对优势:陶器以鬲、孟、豆、罐、盆、甑、钵等,质地主要为夹砂陶,也包含少量泥质陶和印纹硬陶(表面饰米字纹、叶脉纹、方格纹等),建筑材料有板瓦、筒瓦等,生产工具具有陶纺轮、陶拍等。青铜器有箭镞、刮刀、带钩、鼎足等。铁器有锄、戈等;除此之外也出土有少量具有本地越文化风格的陶器(如表面饰米字纹、叶脉纹、方格纹的印纹陶罐)以及扁茎铜剑和铜刮刀等。根据典型器物的时代特征结合十四测年数据,初步推断向家洲遗址的主体年代大致从战国早期延续发展至战国末期,下限可至汉初。

以往长沙地区的楚文化考古工作主要是围绕城区配合基本建设而开展,发现的遗迹以墓葬和城墙最具代表性,相关研究也多是以此为基础开展,主城区以外发现的楚文化遗存以考古调查材料为主,沩水流域已发掘的遗址中仅在罗家冲、花草坪和新屋湾遗址的上层遗存中有少量发现。因材料零散尚未建立与楚墓分期相对应的居址分期体系。向家洲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填补了楚文化居址材料的缺环和空白。

向家洲遗址是迄今所知长沙地区先秦时期遗址中现存面积最大的一处,其发现与发掘为全面了解长沙地区楚汉时期基层聚落文化特征以及研究和认识楚文化南渐过程提供了重要基础材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曹栋洋 王亮 何佳)

北园遗址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平江街道北园新村西侧、北园路北侧,处在苏州古城区东北隅,北侧紧邻现存古城墙北段,西南距位于子城区域的金城新村遗址约2.5千米。

为配合古城区基本建设,2023年秋冬遗址所在地块开展前置考古调查勘探发现文化遗存。2024年4月起,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遗址开展发掘,取得重丰富考古成果。

发掘表明,北园遗址是苏州古城区一处自商周延续至明清时期的墓葬,共计清理灰坑、灰沟、水井、柱洞、墓葬等遗迹1500余处,其中水井450余口,出土陶、瓷、铜、玉、石、漆木、骨角、建筑构件等各类器物2000余件(组),大部分遗迹、遗物属东周秦汉时期。

主要收获

后马桥文化遗存

未发现文化层,遗迹有水井1口。

J16,土坑井,井口平面近圆形,斜直内收壁,底较平。井内填青灰淤土,细腻湿润,并底部出土云雷纹底硬陶罐、绳纹底灰陶罐各1件。井口径1.32米,底径0.98米,深2.8米。

东周遗存

东周时期水井、灰坑、灰沟等遗迹分布广泛,存在众多叠压打破关系,水井中出土罐类汲水器大都较完整,灰坑、灰沟中遗物种类丰富,黑皮(衣)泥质陶器、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及板瓦、筒瓦共出,器物组合丰富而清晰。

J259,土坑井,开口平面形状近圆形,井壁较直,井底较平。井内填灰褐色土,较疏松,饱水湿润。出土器物有黑衣灰陶罐、豆、盘及印纹硬陶片、板瓦片等。纹饰流行素面、米字纹、弦纹、小方格纹。井口径1米,底径0.92米,深2.6米。

J277

J277,土坑井,开口平面形状近圆形,口大底小,井壁斜直内收,壁面较粗糙,底部较平。井内堆积可分为3层。井口径1.16~1.18米,底径0.80、深1.68米。

H59,开口平面形状近圆角长方形,坑壁较直,底部略有起伏,灰褐色填土中包含草木灰,土质疏松,出土黑衣灰陶罐、盆、器盖、原始瓷碗、素面筒瓦等较为完整的器物。坑口长2.34米,宽1.12~1.48米,深0.32~0.52米。

东周时期器物群包含黑皮(衣)泥质陶器、夹砂陶器、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石器、木器、建筑构件等。泥质陶器包括各式罐、折腹盆、浅腹盘、三足鉴、矮裆鬲、高柄豆、贯耳壶等,器表附着磨光黑皮,简洁光亮,局部饰以弦纹、戳印纹、篦点纹、篦划纹;夹砂陶器较少,有釜、鼎、鬲、多残片。原始瓷器有碗、钵、盘、罐等,碗为大宗,分为直口内收腹和子母口斜直腹两类,直腹杯状稀见,流行轮旋纹、米字纹、水波纹、划刻纹等;印纹硬陶器主要是罐、瓮、坛、罐器形大小不一,流行菱格填线纹、席纹、米字纹、方格纹等几何纹饰,组合几何纹和麻布纹少见。石器有锛、凿、砺石等。建筑构件有泥质陶筒瓦、板瓦,筒瓦同样器表附着光亮黑皮,内壁突出瓦钉,瓦舌与瓦身一体成型,侧缘线割痕迹明显。青铜器有剑、铍、削刀、带钩、鱼钩、扣件、蚁鼻钱等,于井中出土了一柄青铜剑,为苏州古城区第一次经科学发掘所获。

通过与苏浙沪皖地区的东周遗存比较,我们发现以最富特色的黑皮(衣)泥质陶器为中心,结合夹砂陶器、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的组合群,在江苏邳州九女墩、六合程桥、镇江北山顶、茅山半岛、常州前桥村、南舍庄、上海戚家墩、马桥、安徽宁国灰山、马鞍山五坦岗、浙江绍兴董家桥,以及苏州澄湖、独墅湖、西塘河、新庄、真山、虎丘、山丘、通安等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的诸多遗址,墓葬内均存在或多或少的同类器群,这些遗址、墓葬的分布均位于春秋晚期吴国鼎盛时期的核心疆域范围内,并呈现出以苏州为核心的分布趋势。因此,我们认为主体年代为春秋时期的北园遗址东周器群,与春秋晚期吴国密切相关。

此外,北园遗址东周器群中还有少量战国中、晚期器物,是自春秋晚期以来,吴、越、楚先后统治苏州地区这一历史进程的反映。

秦汉时期

北园遗址秦汉遗存同样丰富,反映出强烈的人群活动背景。遗迹类型包括灰坑、灰沟、水井、柱洞。灰沟规模庞大,灰坑多见形状较规则的长方形直壁坑,水井既有土坑井,也有陶圈壁井,部分井口围以柱洞,可能是井亭建筑痕迹。

J287

J287,土坑井,开口平面形状近圆形,井壁较直,底部较平。井内填土为灰褐色,夹杂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出土灰陶罐2件(其中一件戳印“吴市”陶文)、板瓦1件、筒瓦1件及少量陶片,判断年代为秦代。井口径1.04米,深1.59米。

J244,陶圈壁井,平面呈近圆形,土坑直壁,井底较平。口径约1.5米,深2.6米。井内居中叠置陶井圈,残存5节,井圈通高2.05米,井圈呈收腰状,居中有一对穿孔,井圈外径0.70~0.72米,壁厚0.02~0.03米,穿孔径0.04米。井内堆积分为2层,出土器物有陶罐、板瓦、纺轮、半两铜钱及戳印“宜之信玺”陶文片,判断年代为秦汉之际。

H78

H78,局部被现代坑破坏,被H77打破,打破生土。发掘部分开口平面形状近三角形,弧壁略呈台阶状,底部较平。坑长6.02米,宽0.8~2.68米,深1.56米。填土分3层:①层灰黄土,②层灰褐土夹草木灰,③层青灰淤土,在②③层间有木板和4根起支撑作用的圆木横柱组成的棚架结构。②层包含物丰富,出土有泥质灰陶罐、盆、甑、夹砂灰陶盆、原始瓷碗、印纹硬陶罐、“舍”字铭文绳纹板瓦片、残漆盘等。鉴于H78存在棚架结构,③层为长期水环境淤积,其可能具有特殊功用。判断年代为汉代。

秦汉时期出土器物以罐、盆、甑、钵、炉、博局盘等日用陶器和陶拍、纺轮、网坠、砾石等生产工具为大宗,并有卷云纹漆盘、水晶珠、半两、五铢铜钱等。

汉代“舍”字板瓦

钱,云纹瓦当、绳纹筒瓦、板瓦、几何纹方砖等建筑构件也较多。

此外,陆续出土了三件戳印“吴市”陶文的陶罐及其组合器,当是秦统一江南后的官作陶器,提供了极具断代价值的江南型秦代陶器标准器群。此前,金城新村遗址出土的绳纹筒瓦上有“右”字陶文,是秦会稽郡“右司空”的戳记。

在出土的汉代绳纹板瓦内壁还发现模印“舍”字陶文者十余例,可能属会稽郡治吴县之“传舍”类建筑专用构件。以上秦汉陶文新材料,为探究秦汉会稽郡及郡治吴县的建置、机构与工官制度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他遗存

六朝及以后各时期,遗迹数量迅速减少,主要是水井和大型灰沟。水井新出现了砖井壁,井深较东周秦汉时期普遍多出1~2米;多条长达几十米的灰沟,结构规整笔直,沟内遗物数以百计。瓷器占据这一阶段出土器物的绝大多数,器类有碗、钵、盘、洗、盒、罐、鸡首壶、执壶、灯、熏、虎子、粉盒、盒、罐、碗、盒等,并有陶盆、纺轮、釉陶瓶、象牙尺、木梳、铜勺、铜钱、砾石等各类日用品,以及“太康”“朱”“丁”“长洲”等铭文砖、瓦构件。瓷器所属窑口以南方地区的洪州窑、岳州窑、湘阴窑、长沙窑、婺州窑、景德窑等为主,北方窑口产品较少。

发掘过程中,通过对包含物丰富的遗迹单位填土进行筛选、浮选,收获了数量可观的动植物遗存。其中,动物骨骼标本初步鉴别有狗、猪、马、黄牛、梅花鹿、獐、龟、鳖、扬子鳄、鼠、淡水鱼类、海洋鱼类等,体现出肉食来源的多样性;而鹿角既有完整者,也有切割、磨制明显的成品工具,废弃坯料、大植物遗存有各种炭化木块、芦苇、竹片、稻米、黍、稷、甜瓜籽、核桃等,揭示出东周时期该地区的环境背景,以及水稻种植为主、黍稷为辅的农业结构。下一步,将继续深化多学科合作,获取更加全面的遗存信息。

价值意义

通过本次发掘出土的各时期遗迹及典型器物,北园遗址可建立起自商周至明清时期的长时段文化发展序列,符合文献记载中关于苏州地区历史演进的整体性描述。其中,以黑皮(衣)泥质陶器、夹砂陶器、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高等级建筑构件等构成的东周器群,主体时代在春秋之际,无疑与鼎盛于春秋晚期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吴国密切相关。部分早